

## 第七章

### 結論

二十世紀中國的「當代新儒家」，是中國儒學史上第一批與西方文化接觸的儒家學者，其中徐復觀因具有日本經驗並經由日文而理解西方文化，而使他在「當代新儒家」之中較為突出。這部書探討的是徐復觀及其思想，所以我特別扣緊徐復觀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而立論。為了有效地刻劃徐復觀及其思想的特徵，我們以徐復觀對「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個問題的思考作為分析的主軸，將徐復觀置於二十世紀東亞儒家思想史的光譜之中加以考察，一方面將他與他的思想論敵如胡適、傅斯年、錢穆對比，又將他與同時代的學侶唐君毅、牟宗三比較；另一方面又將他與二十世紀日本的澀澤榮一、福澤諭吉互作比較，既求其同，又求其異，以突出徐復觀在二十世紀東亞儒學史上的特殊地位。相對於唐、牟二先生之為哲學家而言，徐復觀是一位思想史家，所以本書第二章先分析徐復觀的思想史方法論，作為本書探討的起點。

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家思想人物中，徐復觀較為特殊之處在於他早歲留學東瀛，能閱讀日文著作，並經由日文作品而接觸西方文化與學術，因此，他回顧並展望中國文化時，時時以日本及近代西方作為參照系，使得他的思想具有鮮明的東亞視野，而與其他的當代新儒家有所不同。為了突出徐復觀的東亞視野，本書在第三章討論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及其自我定位之後，第四章及第五章分別討論他對通過日本而

理解的西方近代文化與他對日本文化的評論。徐復觀與澀澤榮一雖同樣推崇孔子與《論語》，但徐復觀期許的是經由自耕農階級的興起而帶動農業中國的復興，為未來民主中國奠基，但澀澤榮一卻努力於將《論語》與算盤融合，在「義利合一」的新理念之下將孔子思想遺產轉化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倫理。徐復觀所憑藉的是悠久的中國農業文明，而澀澤榮一思想的背後則是近代工業文明。這是「農業的」與「工商業的」視野的對比。也因此，徐復觀批判西方近代化文化中的縱慾、貪婪與病態的個人主義，但福澤諭吉則要求東亞知識份子以近代西方為師，才能脫離落後與愚昧的東亞歷史宿命。

在當代中國新儒家學者之中，徐復觀的史學取向與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學取向大相逕庭。更具體地說，唐君毅哲學中的黑格爾(1770-1831)傾向與牟宗三哲學中的康德(1724-1804)因素，都與徐復觀思想中的馬克思(1818-1883)因素，構成鮮明的對比。徐復觀在中國歷史中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與血淚，他像一隻年邁的鮭魚一樣地，奮其生命力游回他精神的原鄉，這就是孔孟的古典儒學的世界。本書第六章討論徐復觀對古典儒學的解釋，這是一種作為政治學的古典詮釋學。徐復觀與唐、牟的對比，正是古典儒學與宋明理學的對比。在某種意義下，也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與形上學的對比。徐復觀筆下的「人」是胼手胝足參與生產勞動的人，而唐、牟筆下的「人」，則是負杖逍遙、「思入風雲變態中」的玄思冥想人物。

從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及其對日本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我們可以發現：從「自我」的角度來看，「自我」

的覺醒與重建，常常透過對「他者」的接觸與觀察而完成。但是，從「自我」與「他者」互動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是通過「自我」而理解「他者」。如果缺少了「自我」的主體性的照映，那麼，「他者」的特質就常常難以彰顯。在徐復觀的生命歷程之中，「政治的自我」與「文化的自我」是兩個最為突出的面向，而「文化的自我」遠比「政治的自我」重要。在徐復觀的學問與思想中，「政治的自我」臣服於「文化的自我」之下，而且接受「文化的自我」的指導。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說，徐復觀的「文化的自我」具有「人民的」、「實踐的」、「農本的」特質，這與他所描繪的由專制政體、經世儒學與農村社會所構成的中國文化圖像是分不開的。徐復觀通過他所建構的「文化的自我」，而觀察日本文化，就感覺日本民族有一種悲愴性的性格，知識份子常有某種「鋸齒型的心理習性」與「文化的直腸病」，日本政治不免有暴力傾向。他對日本的評論雖然不能免於激越，但是卻有洞見。他基本上是通過中國農村社會傳統中所見的「中道精神」，而評論日本社會與文化。

再從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批評來看，他敏銳地指出西方近代文化的「異化」之特質，他甚至認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對人類的愛，表現而為一種反理性的思想傾向。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也許不能免於持論激越之弊病，但是，從他所身處的二十世紀動盪、亂離、撕裂的苦難歷史背景來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徐復觀思想中的「文化的自我」，是身處與「他者」及大自然親切互動脈絡之中的溫潤圓融的「自我」，他之所以批評西方近代文化展現一種「非人間」的虛無的黑洞，實在是從他所理解的中國文化之核心價值理念所提出的批

評。

從徐復觀思想的內涵來看，徐復觀雖然是從「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契入，但是他實際上是在苦思「民族的」文化遺產與「民主的」的現代祈嚮，如何而可以融合為一，為二十一世紀中國開出新的生命。徐復觀畢生所思考的究其實正是「文化的特殊性」與「文化的普遍性」的互動與融合的問題。更進一步來說，任何文化傳統及其生活方式如農本主義、經世儒學與專制政體，都是特定時空因素交織下的產物，都具有「時間性」(temporality)與「空間性」(spaciality)，因而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包括徐復觀在內的二十世紀東亞知識份子所面對的問題是：源於近代西方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民主政治等，隨著最近二百年來西方勢力的東漸，而成為全球「普世價值」。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面對的這個問題，雖然在形式上是以「中國 vs. 西方」、「傳統 vs. 現代」的方式而呈現，實際上它所觸及的是「文化的特殊性」與「文化的普遍性」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東亞知識界，徐復觀的突出之處在於他認知「文化的特殊性」與「文化的普遍性」兩者之間，並不是一種「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徐復觀深刻地認知：「文化的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的因子，他指出：儒學傳統中的人本主義與「仁」道是偉大的「普世性」的精神遺產，但被二千年來中國專制政治所玷污，因此，他努力於儒學的「主體性轉換」的偉大事業，他要求中國知識份子將傳統儒學中的「國君主體性」轉化為「人民主體性」。他不為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權唱輓歌，他奮起心志，高唱人民勝利進行曲，迎接二十一

世紀民主中國的曙光！

相對於福澤諭吉所堅持的「脫亞入歐」的主張，徐復觀強調從中國文化中的儒學「主體性」的轉換以及從農業傳統中自耕農的復興，而開出現代民主政治的新格局。徐復觀由於深入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可以從其中開發出具有普世性意義的價值理念，因而使「傳統」與「現代」更能融合一體。

徐復觀也敏銳地認識到，所謂「文化的普遍性」或「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源起於近代西方的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不能只停留於抽象理念的層次，「普世價值」必須落實到人民活生生的、具體的、有血有淚有歡笑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且隨著人民日常生活而與時俱進，增益其內涵，才能為人民創造幸福。徐復觀的人性論、政治經濟學，以及他的「人民主體性」的經世儒學，都使他堅信「抽象的價值」只能在「具體的生活」中尋覓。徐復觀所開出這一條道路，在思考方法上是「反實證主義的」(anti-positivistic)，在思想內容上是「反形上學的」。徐復觀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的設想，並不是訴諸於「良知的坎陷」，也不是盲目地將西方式的以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經濟社會基礎的民主政治進行橫面的移植，而是訴諸於中國農村文化社會中自耕農階級的壯大與儒學傳統中「人民主體性」的彰顯。誠如我在本書第四章第四節所檢討的，徐復觀對二十世紀中國民主的展望，固然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斟酌的地方，但是從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民所承受的「觀念的災害」的茶毒來看，徐復觀的道路相對而言可能是二十一世紀東亞的諸多進路中，一條較為平易可行的坦途。